

**浅谈英殖民初期的砂拉越华社之社会结构——
从田汝康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说起***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arawak Chinese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by Dr. Tien Ju Kang**

林青青**
(LING Ching Ching)

摘要

二战后的5年，也就是1946至1950年间，砂拉越境内和国际间都发生了不少划时代的大变动，砂拉越从一个英人家族王国变成英国政府殖民地之后，改变了整个砂拉越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更如巨石入水般，在海外华侨社群中激起无数涟漪，砂拉越华人在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也因此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段时期华社在各个层面上的改变决定了往后数十年砂拉越华人的命运，也锁定了砂拉越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而田汝康博士在1950年6月发表的《砂拉越华族》报告书正是这段时期砂拉越华社较为中肯、严谨、有系统的学术纪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报告书虽碍于篇幅，无法完整、全面的记录砂拉越华人在各方面的作为及情况，但透过田野调查所收录的种种华社实况却真实的拼凑出战后砂拉越华社面貌，堪称战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研究调查的经典之作，也是学术界研究砂拉越华人最广为参考并引用的学术报告书。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及文史工作者都先后以此报告书为研究战后砂拉越华族社会结构的主要导引。

本论文以《砂拉越华人》报告书为主轴，重现战后砂拉越华人在社会、经济、教育及政治等层面的实际情况，从社会结构的变动窥探华社的意识形态变化。

关键词：田汝康、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英国殖民政府

* 本文曾在第三届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研究”学术交流会（2012年9月30日，砂拉越诗巫）上宣读。

** 林青青 自由撰稿人。电邮地址： anasa02@yahoo.com

Abstract

Five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6-1950), a time of drastic changes throughout the world, Sarawak was converted from a land that was ruled by a British family to that of a colony under British rule.

The transition to Crown colony status took place when Rajah Charles Vyner Brooke ceded the state to Britain in 1946.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Sarawak, with its multi-ethnic population, was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hinese, their political loyalties and their co-existence with other communities within Sarawak.

Tien Ju Kang, a social anthropologist, was sent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arawak. His research in Sarawak was focused on the role of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ir economic role. His report was submitted to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n England, and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a monograph.

Despite some omission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natives,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 Foochow community in Sibu, Tien's report sheds considerable light on the sociolog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of Sarawak. It has become a classic on the Chinese in Sarawak widely read and frequently quot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e report serves as a landmark research on Sarawak Chinese and provides insights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arawak Chinese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Tien Ju Kang, Sarawak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一、前言

二战后的五年,也就是1946至1950年间,砂拉越境内和国际间陆续发生了不少划时代的大变动,砂拉越从一个英人家族王国变成英国政府殖民地之后,其政治、经济、社会面貌也随之改变,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更如巨石入水般,在海外华侨社群中激起无数涟漪,砂拉越华人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也因此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骤起的时代风云改变了砂拉越华社的命运,也决定了华社往后数十年的发展方向及社会定位。而田汝康博士在1950年6月完成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正是这段时期砂拉越华社较为中肯、严谨、有系统的学术纪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概说与定义

在专研砂拉越的学者不多，华人学者尤其屈指可数的年代里，《砂拉越华人》报告书可说是第一本由华人用英文写成的砂拉越华人研究专论，报告书中所收集和整理的各种数据和文档资料，尤其难得一窥的官方资料成为研究战后初期砂拉越华人社会的必备史料。

虽然此报告书碍于篇幅，无法完整、全面的记录砂拉越华人在各方面的作为及情况，但透过田野调查所收录的种种华社实况却真实地拼凑出战后砂拉越华人社会实况，堪称战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学术界研究砂拉越华人最广为参考并引用的学术报告书。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及文史工作者都先后以此报告书为研究战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的主要导引。¹

本论文以《砂拉越华人》报告书为主轴，重现战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的宗族观念、会馆组织、各种主要的经济活动及相关事宜。

（一）“殖民”的定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席卷全球，西方列强也全力扩张领土，在一波又一波的侵略与蚕食行动中，亚非各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受保护领土”。其中欧洲海上霸权的英国更成为“最为凶狠的帝国主义国家”，（高亚伟 1975：21）侵占了包括印度、缅甸、马来半岛和北婆等地区，势力范围之大，使它成了举世闻名的“日不落帝国”。

大多数学者都将这些军事侵占、政治统管的行为称之为“殖民”，而受侵占的领地则为“殖民地”。

“殖民”原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在资本主义时期，指资本主义国家将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掠夺和奴役当地人民。

“殖民地”则指一个国家在国外侵占，并将人民大批迁移到此的领地。（Hanks 1988：219）在资本主义时期，指的是被剥夺了政治、经济的独立权力，并受其移民所管辖的地区或国家。

而殖民主义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强国对力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通知、奴役和剥削的政策。殖民主义主要表现为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原料掠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97：1617）

列强在亚非地区的军事侵占活动并非如英国对北美的殖民，清教徒、囚犯及平民分批移居北美各地，（伊士顿 1969：259-261）因此，严格上来说，那并不是殖民活动，而是“一个国家对其它领地的扩张和统治，是一种由个人、国家、机构所掌控的权力扩张”（Hanks 1988：565）的帝国主义使然。然而，大多数学者和文史工作者都习惯性的将“殖民”一词套用在所有海外军事侵占和政治统治活动，因此，“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甚至打上了等号。（Hanks 1988：219）

“殖民”既是国与领地之间的关系，如此，砂拉越的殖民时期就与其它英殖民地不太相似。

¹ 学者如 Richard Outram、周丹尼、刘子政、Robert Pringle、田英成、黄枝连、Michael B. Leigh 等。

（二）砂拉越历史简介

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因协助汶莱苏丹评定砂拉越乱事有功，自1841年9月24日开始，砂拉越成为英国布洛克家族的管辖领地。从此开始了往后长达105年的“白人拉惹时代”。

在漫长的105年统治期间，除了日治时代的3年又8个月之外，砂拉越先后由3位白人拉惹统管，第一代拉惹詹姆士布洛克（1841-1868）、第二代拉惹查理士布洛克（1868-1917）和第三代拉惹维纳布洛克（1917-1941）。（Ooi 1997: 21-49）

虽然砂拉越在战前并不是英国殖民部所管辖的领地，但白人拉惹的统治却使砂拉越成为一个极为“英化”的王国。

二战后，苍痍满目的砂拉越百废待兴，当时已年届古稀的第三代拉惹维纳布洛克在资金不足、军备无力、家族恶斗之下，委实无法力挽狂澜，决意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政府，由英国殖民部全权接管。

砂拉越自1946年7月1日正式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另一个殖民地。而英国殖民部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63年，前后共17年，因此，更为确实的来说，砂拉越的殖民地时期应由1946年算起。

1946年对砂拉越而言，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战前，白人拉惹以极其保守的手法统管砂拉越一个世纪之久，境内所有事务归拉惹一人管辖。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境内人口增加和频密的商业活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在缺乏支援和资金的白人拉惹统管期间，砂拉越境内的社会变动并不大，硬体设备也不见齐全。（Pringle 2010: 383）

战后，英国殖民部的接管意味着砂拉越不再是个“家族的王国”，而是一个“帝国的领地”，很多事务也随之改变，包括境内华人的社会结构。

（三）砂拉越华人史料与文字资料

砂拉越华人社会的中文历史文献向来不多，尤其二战前的文字记录更是凤毛麟爪，屈指可数。这或许是“…因地处婆罗洲西北角，一向不受人重视，西方学者当时的兴趣，除了宣扬殖民地统治的‘丰功伟绩’外，都把精神集中在土著的研究分析上，华族史的研究也被忽略了”，（饶尚东 1995: 73）又或许早期移民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未曾意识到保存史料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客观环境，动乱迁徙使然。不少研究砂拉越华人历史的文史工作者都曾面对史料不全，甚至严重匮乏的窘境。（蔡增聪 1998: 19）因此，不少文史工作者只得借助英文资料和各种相关著作来填补中文文献的不足。

华人移居砂拉越由来已久，然而根据官方记录，大规模移民活动是在白人拉惹时代，尤其第二代拉惹查理士布洛克统治期间。²（Chin 1981: 51, 68-69）

人口的增加，使华族人成为砂拉越境内重要的社群，长久以来，砂拉越华人在经济方面的杰出表现备受肯定，而华人的努力奋斗也是砂拉越进步与发展的其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动力。

（Brooke 1990: 84）³

在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主导下，早期砂拉越华人与其他海外华人一样，以经济发展为主

² 在 1851 年《砂拉越宪报》的年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族人口为 4947 人，1919 年，Baring-Gould 和 C.A.Bampfylde 估计砂州华族人口有 4 万 5000 人，而到了 1939 年，砂州人口普查结果，华族人口有 14 万 5158 人。

³ 查理士布洛克曾经说过，“华人是一种了不起的民族，没有华人的努力奋斗，东方国家难有成就”。

要考量,鲜少涉足经济圈以外事务,然而,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影响却翻转了砂拉越华人的思维方式,并进一步改变华社的社会结构。

二战后的五年(即1946-1950年)是砂拉越华人社群的重要转折点,其中1946年的让渡事件、国民党在古晋设立海外华侨俱乐部、1948年,殖民地政府通过“本地权力法令”(Local Authority Ordinance)、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古晋设立领事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地位,中国领事馆随即关闭等重大事件都在牵动砂拉越华社,甚至砂拉越全境人民的神经,引发了1950年之后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剧变,如回国青年热潮、紧急法令、大逮捕、反殖反帝活动等,甚至也促使砂拉越人民成立以华党员居多的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换句话说,此期间华社在各个层面上的改变决定了往后数十年砂拉越华人的命运,也锁定了砂拉越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而田汝康博士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正是这段时期较为中肯、严谨、有系统的砂拉越华人学术报告书。比起白人的各种浪漫热带雨林猎人头记事小说,田汝康藉由各种访谈、对话和考察心得,以及各种文档资料与当年砂拉越许多社团和学校单位的各种数据和记录来拼凑出战后初期砂拉越华人社会的部分图像,是较为真实可信又可考据的一种做法。

三、田汝康博士和《砂拉越华人》报告书

(一)田汝康简介

1916年生于中国云南昆明的田汝康出生商贾之家。1935年至193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修读大学部课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学习中断的他曾经一度从军抗日。1939年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1940年取得学士文凭,而后参加燕京大学云南社会学工作站——魁阁,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云南缅甸边境傣族社群,完成了《中缅边境傣族宗教仪式研究》。

1943年,田汝康原本计划赴美深造,奈何无力承担路费,翌年,他参加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于194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48年,英国伦敦大学以政治与经济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来肯定他的努力和学术造诣,田汝康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Religious Cult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 States of Yunnan-Burma Frontier* (《中缅边境傣族宗教仪式研究》)。

取得博士学位后,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委派他前往砂拉越,调查砂拉越华人社会情况(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1950年,他完成了《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报告书》(*A Report on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arawak*),经修改付梓成书,1953年,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由伦敦大学人类学系出版,1997年砂拉越研究资料中心再版。

以英文写成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出版后,引起各方注意。由于报告书一反以往殖民地官员的西化思维,以华人立场来阐述华社内部结构与各方面的诉求,加上田汝康本身亲共思想,英国殖民政府恐其报告书内容有危害殖民地政府之虞,故将此书列为禁书。⁴

(刘子政 1992: 60-61)

⁴ 另一种说法则是田汝康的亲共思想和他在离开砂拉越之前在公开演讲中极力推崇共产思想的做法引起英殖民政府的不满和担忧。

田汝康也因此深受其害，在重重舆论与政治的压力之下，田汝康辞退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一职，在1950年回到中国，担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授课，担任博士班导师。

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位曾经公然抨击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学者备受批判，吃尽苦头，文革结束后，田汝康回到学术研究岗位上，继续钻研中印和中俄边界问题，后来因为政治因素而入狱两年。

1979年田汝康对邓小平政权下的中国极度失望，毅然远赴英国剑桥克莱尔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并在1979年至1992年间先后出任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普林斯顿大学东南亚研究的访问教授。

而后，田汝康重返中国，除了教学外，更出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顾问。

一生致力于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世纪中国航运史及中国云南省宗教之研究的田汝康先后完成不少中英文著作和专文，主要著作有 *The Chinese of Sarawak*、《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及《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等专著。又曾以中英文发表了《砂拉越华人三十年来的变迁》、《婆罗洲客家公司》及《中国与胡椒贸易》等论文四十多篇。

田汝康于2006年7月20日在中国云南逝世，享年91。

（二）《砂拉越华人》报告书

1946年6月，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为深入研究并调查新加坡社会种种问题，设立了“社会福利部”。不久马来亚殖民政府也成立“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星马一带对各族群做了相当详尽的研究调查工作。

在该理事会的资助和推动下，英国学者巴素（Dr. Victor Purcell）在1948年和1952年分别完成并出版了《马来亚华侨》和《东南亚华侨》。其它报告书包括芬特（Raymond Firth）的《马来亚社会科学研究》、《马来渔民》及弗里曼《新加坡华族的家庭与婚姻》。田汝康博士的《砂拉越华人》也是其中一本份量不轻的报告书。（刘子政 1992: 58-59）

田汝康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的4名学者之一，除了专研华人的田汝康之外，还有研究比达友族的威廉格德斯（William Geddes）、研究马兰诺族的史提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和研究伊班族的德利克菲立门（Derek Freeman）。当时这些族群调查工作主要是“为了协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有效的统管砂拉越各民族”。（Tien 1997: VII.）

1948年田汝康到砂拉越，他是战后第一位到砂拉越来调查华社情况的华人学者。由于古晋是当时殖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和政府要员所在地，不同籍贯华人多杂居其中的现象，因此在他看来，是研究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最理想的所在，加上砂拉越境内交通不便，行走艰难，因此，9月7日田汝康到古晋展开调查工作后，其活动范围就以第一省古晋为主，而大部分调查背景也都侧重在古晋及周边地区的华人。

田汝康用一年的时间游走砂拉越各地收集各种文字和非文字史料，一年后，他完成了田野调查工作，在离开砂拉越之前，田汝康到各地会见华社人士，并巡回讲演，1949年9月3日、6日及8日，分别在诗巫“青年协进会”、诗巫中华中学、诗巫卫理高级中学、诗华教师会、兴化莆仙公会等地讲演。但讲演内容却没有见报。（刘子政 1992: 61-62）

1949年10月23日，田汝康乘坐“布洛克拉惹号”（Rajah Brooke）到新加坡，临行时向送行群众说，“我们虽然分离，但我们的思想和共同目标将使我们更加密切”。（刘子政1992：59）

返英后，他查阅殖民地档案，找出许多文献记录。1950年6月，发表了“砂拉越华人”报告书。

（三）《砂拉越华人》报告书主要内容

《砂拉越华人》报告书分为10章，主要内容涉及砂拉越华人如何应对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华人移居南洋的各种管道和困难、“新客”如何适应并开始侨居地的新生活、各种地缘性方言会馆的存在意义与社会及经济功能、砂拉越各城镇与乡区华人的经济类型和各种商贸交易情况、籍贯行业识别与经济状况分析、华社寡头领导所衍生的问题以及砂拉越华社与祖国之间的关系。

报告书中也收录了“华人在砂拉越的早期历史”、“婆罗洲客家公司”及“1947年人口普查报告中的砂拉越华人口：方言群人数统计表”。

《砂拉越华人》以社会学角度剖析战后初期砂拉越华人社会架构，并以经济为主要脉络，连贯每个社会层面和各个主要范畴，包括宗族关系、商业活动、社会权力，甚至政治和海外华人的身份及情感认同。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宗族关系铺陈出一个华人社会经济体。

田汝康以数据和资料为佐证，进一步说明华人既有的宗族观念在经济为导向的海外华人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引发的种种效应。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交织之间，牵引出战后初期砂拉越华人社群的实况及所面对的困境。

1、报告书各章节简介

第一章概论，谈论的是在战后东南亚这个骤变的大环境中，华人移民如何因应各种新挑战和环境变化，田汝康在这一章里清楚交代本身的研究范畴和目的。

第二章，田汝康以数据说明华人移民的导因，并以个案来描述华人在南洋及砂拉越的实际情况，包括海外华人刻意凸显中华文化的祖国情结。他以“一个海南人说，海南岛的河流和溪流流向远方，流入遥远的大海，但他们至终还要归来。”来概括华人对祖国的缅怀，说明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和很多海外出生的华人都将他们的目光定焦在中国，他们始终心系祖国。

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七章，田汝康的研究重点是华社的宗族和方言群之间的关系，还有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借贷制度——砂拉越乡区经济架构中特有的经济形态。

第八章讨论的是砂拉越城乡经济体制的互补现象和橡胶贸易，实际上却点出不同方言群之间悬殊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的经济地位所构建出来的特殊环境社会关系。

第九章则将上一章的社会经济关系扩大至社会各个领域，展现出砂拉越华社“财力决定权力”的“金钱权力”之影响层面及其负面作用。

最后一章田汝康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情感四方面来探讨砂拉越华人与祖国的关系，并以砂拉越华社最深沉的诉求总结了整个调查报告。

2、值得注意的一些细节

为了更深入探讨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田汝康以五个章节来解说华人社会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从各种关系，尤其宗族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现象、族群问题和各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如此的侧重，难怪有学者认为《砂拉越华人》报告书的重点是“放在华族会馆功能的分析上”。（饶尚东 1992：14）

田汝康在报告书列表里的种种数据所呈现的是严谨的科学研究手法，然而，这些数据说明的是事实，还有“说明事实”的动机。

在第一章里，田汝康清楚阐明本身的调查工作主要是为了“找出海外华人社群用来应对新挑战和各种变化的特定方式”，（Tien 1997：2）而他也重申本身所研究的“只是一个经济还在起步的英殖民地范围内的华人社群”，而非所有海外华人问题。他清楚交代，“我在研究所得到的任何结论和推理都不一定适用于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其他社群”。（Tien 1997：2）

然而，《砂拉越华人》除了是一份学术性的调查结果报告书之外，也是一份砂拉越华人诉求。整体上来说，田汝康是英国殖民地政府所委任，而调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协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有效地统管砂拉越各个族群，因此田汝康按既定的议程完成的《砂拉越华人》报告书有不少篇幅都在向读者解释砂拉越华人社会中存有的各种看来特别奇怪，甚至荒谬的现象和情况，从一般人对海外华人的看法到华人社会里的宗族观念、宗亲会和地缘性公会之间的重叠和互补作用、不同方言群聚居，甚至各自为政的特有现象、华人对社群领导的矛盾心理，乃至华人对祖国的眷恋和情感依归，田汝康都清楚交代，甚至举出实例加以说明。

在报告书的最后一章，田汝康提出砂拉越华人所面对的困境，并且大胆建议英殖民地政府转换思维方式，改变既有观念，让新移民有机会参与国家建设大业，才能达致双赢的局面。

“…华人与祖国的关系也属正常，没有什么奇怪。只是殖民地官方先入为主的过于担忧“双重效忠意识”，有时似乎也将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眷恋看成是特别难以理解的事。要全然相信对祖国有如此强烈眷恋的新移民是不可能的，要等到他们的情感改变，才能相信他们，殊不知，这些情感是殖民地周遭环境和现有情况使然，因此，如果大环境不改变，我们就不能期待他们能改变什么。换句话说，等他们先改变态度是没有用的，只有给新移民一个机会在国内发展，让他们能充分参与当地事务，分担社会责任，他们才能开始打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如此才有可能让新移民社群对这片滋养他们的土地衍生出一种新的情感。”（Tien 1997：137）

四、《砂拉越华人》所呈现的战后初期砂拉越华社面貌

《砂拉越华人》报告书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展现出战后初期的砂拉越华社面貌，但实际上，所有论点至终还是勾勒出一个以经济为主要导向的华人社会缩影。

（一）宗族制度与经济利益

经济是海外华族社群的主要着眼点，也是海外华族的社会命脉，经济因素是华族移居

海外的主要诱因，也是海外华人拼搏的标竿和终极目标，华人在海外各地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也深得各方，尤其各国政府的肯定。

经济左右了海外华人的社会架构，主导他们的思维方式，也直接支配了他们的意识型态。华人社会的任何范畴、层面都和经济紧密相扣，而掌握经济者自然就成了华社的掌舵者，主导、主宰、主事一切。

砂拉越华社和南洋其它地区华社一样，有着为数不少的会馆组织，田汝康认为，“不同的方言群、地缘性和宗亲会是一个海外华人社群最显而易见的社会架构”。(Tien 1997: 28) 在他看来，错综复杂的宗族制度是海外华人的凝聚点，也是海外华人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Tien 1997: 27)

1947年砂拉越人口普查结果，境内华人共14万5,158人，这些华人和南洋其它地区的华人一样，主要是来自中国近海的福建省和广东省。砂拉越华人主要方言群有十个：福州人、兴化人、福建人、诏安人、潮州人、广东人、雷州人、海南人、客家人和从中国其它地区来，讲华语的华人。

砂拉越华社各个方言群多聚居一处，大部分都从事类似的行业，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方言群行业识别，如砂拉越华社人口最多的是客家人，是以务农为主，多数聚居在第一省及附近地区。第二大方言群的福州人则主要集中在中区，尤其拉让江流域一带，从事建筑和商业活动。兴化人主要从事脚车维修和机械工作，在第一省则多为渔民。福建人和潮州人则分别掌控砂拉越的出入口商业贸易。而诏安人除了务农和从商之外，在战前古晋码头工友也几乎全是诏安人。广东人多从事钟表行，雷州人是主要的木炭制造者，而海南人则以经营咖啡店出名。如此的特殊社会现象造成方言群（籍贯）会馆的成员常与行业公会会员重叠，甚至出现方言群会馆与行业公会资源共享共用的现象。

宗族关系和地缘性或行业公会组织就如同绳索，将砂拉越华人分组紧密圈在一起，然而，真正将华人绑在一起的绳结却还是经济利益。“…提及海外华人，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层面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观察不同方言群会馆的实际活动，我们可以马上看到，没有例外的，它们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上面所说的，联系方言群、地缘性或宗族关系。最重要的还是绝大多数会员所从事的行业之经济利益。”

（二）互惠互利的城镇与乡区经济体

田汝康以纵横交错的手法诠释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他先将砂拉越华人分成城镇华人和乡区华人，再按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特质描述各个不同方言群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由于田汝康的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砂拉越第一省古晋，因此，报告书城镇和乡区自然就以古晋地区为准。第一省乡区居民几乎清一色都是务农的客家人，城镇居民则包括各个不同方言群、不同行业的人。根据1947年人口普查数据，第一省华人总人口6万2,121人中，有3万5,470人为客家人，几乎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在3万5,470名客家人中，住在古晋自治区范围内的客家人只有5,730人（16%）。(Tien 1997: 33)

第一省华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活动。在1947年，古晋从商者有4,201人，其中3,430人是华人。同时有1万3,430名华人务农，以橡胶种植为主。在第一省，共有8,306人从事橡胶生产，其中3,610人（43%）是华人。(Tien 1997: 34)

按田汝康的观察与比较，砂拉越乡区华社的社会架构在本质上和中国农村很相近。砂拉越乡区经济发展落后。除了亲属关系和方言群的凝聚力之外，就没有其它足以维系社会

结构的特殊关系。(Tien 1997: 61)而这种社会群体关系在砂拉越乡区的各种局限性条件中,逐渐发展出一种特有的经济运作模式——借贷制度。

砂拉越第一省乡区以种植橡胶为主,乡区居民可分两个阶级,经营小商店的商人和种植各种作物的农人。砂拉越乡区地处偏僻,与各主要城镇之间相距甚远,加上交通不便,因此主要靠既耗时又危险的水路,往来极为不便。

在缺乏现金的乡区很少现金交易,商家和农人之间的借贷常以货品取代现金。农人在收成之前,先以赊账方式向商家购买日用品和食品,收成后,就以农产品来分批摊还欠债和利息。

农人们竭尽所能的在有限的耕地里,用各种可行的方法赚取血汗钱,但基于各种条件的局限,所赚取的钱往往不够摊还欠债,而碰上雨季过长或生病等没有收入的情况,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只好一再借贷,累计的债务几乎不曾,也不可能还清。

在这种情况下,农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努力还债,二是逃债。乡区农人为逃债而消失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小商家在借贷时,也尽可能提高利息,以防万一。而遇上逃债情况的债主也可以找借贷者的宗亲来为他偿还欠债。

值得一提的是,砂拉越华人在城镇与乡区的经济概况看似两个不同的体制,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关系密不可分。

乡区商家以同样的借贷方式向城镇商家取得他们所要的货物,对城镇商家来说,乡区商家不只是杂货分销商,他们更是橡胶贸易的乡区代理,为城镇商家收购橡胶和其它物产,简单的来说,在经济层面上,两者有互惠互利的依存关系。

(三) 橡胶贸易与方言群的行业识别

砂拉越华社有3种橡胶贸易中间人。从种植者那里收集橡胶,再以贷款方式分配杂货的小乡区商店属于第三等橡胶经销商。他们本身没有直接与出口商交涉,不过他们将橡胶交给市集的商店,商店业者就是二等橡胶经销商,这些第二等经销商是乡区商店与出口商之间的中间人,但其中一些人也直接联系种植者。几间出口商号是第一等经销商,他们在最高层,和种植者或乡区商店都没有直接交涉,他们只和二等经销商交涉。(Tien 1997: 85)

各等级的橡胶经销商也有圈定的方言群,在第三等经销商中,以客家人和福州人居多,这两种方言群也是第一、二、三省乡区的主要农产品种植者。第二等经销商则以集中在城镇市集的潮州人和福建人为主。而第一等经销商中,福建人和潮州人也是主导者。

这种以方言群来划分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橡胶经销商之间,在整个经济结构和行业划分上更是明显。战后初期砂拉越华社之中的方言群隔阂仍然相当明显,各行各业,甚至商业伙伴都以同样方言群者居多。前面已经初步描述了各方言群的行业识别,而在一些行业中的资方和劳方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方言群。

“一种压倒性的趋势是所有的雇主不是福建人就是潮州人,砂拉越其他华人都清楚意识到资金集中在这两组人手中”。(Tien 1997: 92)福建人和潮州人是砂拉越华人经济体中的强势方言群,在古晋9个出口商之中,4个福建人,4个潮州人,1个客家人,砂拉越福建出口商居多的现象,即便在第三省福州人居多的地区是如此。第三省26个出口商之中,12人是福建人,10个是福州人,4个广东人”。(Tien 1997: 87)

“…大多数客家、福建和潮州“烧炭者”都是雇主，烧炭的工作还是由受雇的雷州工人来做…” (Tien 1997: 83)

“在硕莪贸易上也是如此。硕莪生产工作几乎全部都由第三省马兰诺人负责，所有的出口商和大多数经销商都是福建人。” (Tien 1997: 87)

砂拉越的福建人主导橡胶出口贸易，和同样为福建人的新加坡商家之间紧密合作，拓展出属于单一方言群的贸易路线，而古晋的“大九”(Big Nin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掌控杂货入口贸易的潮州人则和新加坡的广东人和潮州人一样占尽优势，他们的经济地位“是因为他们所售卖的杂货主要是从广东和汕头附近地区来的。潮州人在稻米贸易上也特别占优势，大部份稻米从暹罗来，那里的华族人口几乎全是潮州人。” (Tien 1997: 103-104)

由于出口橡胶和进口杂货是砂拉越华人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主导这两种生意的方言群福建人和潮州人就是主导整个华社的主要群体。相较于福建人和潮州人的强势经济地位，华人中人数最多的客家人在经济上就显得微弱。

(四) “财力决定权力”的社群领导

在以经济为主要导向的砂拉越华人社会里，经济地位的高低也决定了社会权力的多寡强弱。

在布洛克时代，拉惹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管理砂拉越王国，为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拉惹和后来的英殖民政府都采用不干预政策，即通过“受认可的华人领导”或华人甲必丹来管理华人政务和社会问题。

而这些“受认可的华人领导”在华社里的影响力大小则和他们的财力成正比，在华人社会里，“经济能力就是社会权力”，因此所谓的华人领导简单的来说，就是华社里有钱的人，通常都是商家和老板。一个有财力的老板自动会赢得一个崇高的社会地位，而崇高的社会地位容易赢得政治权力，掌握了政治权力，财富就自然增加，这是战后初期，甚至数十年来华社所遵循的权势循环程式。

台湾学者黄建淳在其著作中也提到砂拉越华人社会的这种特质。

“…凡雄踞于财者，即便出身卑微或目不识丁，但却可迅速的跃升至社会上阶层；相对而言，倘一旦财源不济、经济条件日趋贫困，其声望地位立刻急转直下，将坠入社会的最低层。这种以个人为基础、以财富为标准的垂直、高度性社会流动率，为历来砂拉越华人社会流动的主要特质…” (黄建淳 1999: 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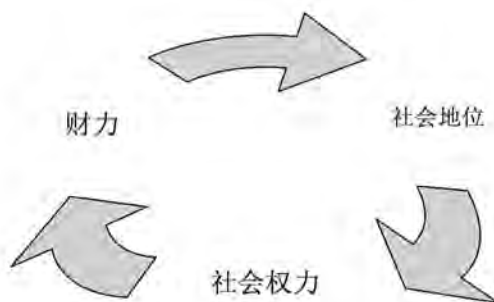


图1：社会权势循环程式

在这样的循环程式中，第一省最有影响力的华社领导就是财力雄厚的福建人和潮州人。因此，古晋中华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总是由上述两个方言群代表出任。

这种“财力等于权力”的社会认同模式影响层面非常大，财力雄厚者的权势几乎渗透整个华社。在商业上，他们主导进出口生意和所有进出口相关事宜；在经济上，他们是借贷制度里的放贷者，也是为很多商家提供资金的“靠山”，掌控城镇和乡区的经济脉搏；在社会层面上，放贷者和借贷者之间存有的“利害关系”让放贷者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华社各种活动，甚至是会馆里的秘密投票活动，大会馆组织的领导人通常也由有钱人出任；（黄建淳 1999：110）在教育上，这些有钱人是资助办学经费的董事部成员，在政府津贴与民间赞助不成比例的年代里，负责付薪资给教员的学校董事部成员自然就全权掌控教师的聘任大权，连校务和校外活动都操控在他们的股掌之间。中国文化里“尊师重道”的观念，在金钱挂帅的社会风气下荡然无存，思想独立的教师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中，也必须“为五斗米折腰”，学校是华社权势的另一个竞技场，而教育也成了社会权势下的牺牲品。（黄建淳 1999：115）

在政治上，牵制各方的有钱人容易炮制出“众望所归”的假象，在财势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有钱人就成了英国政府眼中的华社领导，古晋地区曾经出现“客家地区4位华人甲必丹，3位非客家人”的情况。（黄建淳 1999：117）在“财力换取权力，权力巩固财力”的运作模式下，有财有势的华人领导也尽量利用权力来换取财力，1946年中国国民党在古晋设立海外俱乐部，一些华人领导更藉由加入国民党，向砂拉越华社展示和政治领导的合照及纪念品来炫耀他们的官方联系。

而1948年在古晋设立的中国领事馆也让中国外交部见识了砂拉越华人领导的“影响力”之大。

“海外华侨社群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掌握在中国领事手中，不过这在砂拉越并不全然是这样，相反的，领事大多依赖本地有影响力的华人。虽然领事的薪资和津贴相当充足，实际上，这些钱是绰绰有余。本地华社为他们的领事和他的职员提供几乎所有需要的东西；从床铺的床褥到他的鸡尾酒舞会开销，更不用提他的官邸和汽车。对这些事，领事靠这些华人领导筹钱，而他的权力和威信也大部分为他们所利用。不久前，第一位领事离开砂拉越到美国去，古晋一名华人领导随即发出一封电报给中国外交部，

推荐擢升其中一个受他控制的领事馆雇员出任秘书，有人告诉我，外交部长开始思考他所委任的真正领事究竟是谁。他要想的还有很多，尤其在他意识到这封电报是透过最机密的政府代号发出的。”（黄建淳1999：134-135）

乍看之下，这种“财力换取权力，权力巩固财力”的社会模式似乎有其一定的偏颇与隐忧，但如此一种“‘开放阶级制’（Open Class System）社会系统的形成，…正与砂拉越立国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因素，构造了互为因果的关系。”（黄建淳 1999：415）

在殖民政府以“经济效应为本”的统管理念下，百废待举又物资匮乏的战后初期砂拉越华人社会确实也没有具备任何条件以“符合民主精神”的方式来建构，反而以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

（五）战后的社会变化——方言群“地盘”崩解与新旧派系的角力

田汝康认为，二战过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日治时代和战后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加上新垦区的出现导致频密的人口流动，种种变化严重干扰了砂拉越各地原有的宗族和方言群的“作业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上述两者的固有分布情况。比如，在第一省海岸地区的河婆人聚居地，开始出现一定数量的陆丰人，而战前原本由诏安人垄断的码头工在战后也开始渗入不同方言群的人。（黄建淳 1999：55）

方言群固有的“地盘”崩解后，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方言群影响力的削弱和华语地位的强化。

旧有大会馆组织，包括方言群会馆的权力掌控者表面上看来都是以各自的方言群为根本来发挥并行使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但实际上，他们却都是靠经济利益来巩固个人权势。而在方言群影响力削弱的战后初期华人社会里，越来越多不以方言群为根本的新公会开始出现，受过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强调华语的重要性，誓言建立一个不分籍贯和地缘性的单一华人社群，但旧有掌握权势者却极力想保有旧社会结构里的权势和地位，在建构现代社会、加速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社会重组问题上，两者各持己见，互不让步，这种新旧看法和思维上的分歧逐渐成为砂拉越华社的核心问题。

新旧之分不只是保守派和进步派，或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划分，在田汝康看来，新旧之分实际上是砂拉越华社的一大变化使然，即华社领导层在日治期间及光复后的社会定位。

按田汝康的说法，虽然并非所有华社领导都受过日军的“恩惠”，但“…一些华人领导选择典当名誉来换取舒适生活。最不幸的是，这些人在光复后，仍持续或甚至越来越有钱有势…”（黄建淳 1999：118）

如此的一种情况，造成战后华人领导威信破产，而本应在华社与英殖民政府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华人领导因为情感上的敌对，与华社份子关系日益恶化，民间与领导各自表述，失去民意的领导靠朋党来强化个人权势，而非领导的华社份子则积极拓展另一种与政府直接联系的沟通管道，造成华社内部分歧。

失去威信的华社领导和华社脱节，华社一分为二，二者各自表述，甚至分庭抗礼，

田汝康认为如此一种现象“以目前情况来看，虽仅仅是暗流汹涌，但也可能造成华社的彻底分裂”。（黄建淳 1999：119）

学校，特别是乡区学校董事部主席的领导权更迭就是新旧领导势力角力的一个平台。

“根据古晋的情况，华人甲必丹应该也是当地学校董事部主席，然而，事实常常并非如此。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教育热忱在乡区展现了另一个不同的面貌。一般民众对教育非常热心，但华人甲必丹，通常都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一般上都不太热衷教育，只有一些除外。政府强调每年选举让人民有机会发表意见。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是，在第一或第二年过后，学校董事部主席之位就不再由华人甲必丹出任。在任期间，每一位新任主席都竭尽所能，希望能在校务方面做得比前任更好，因此，就发展出一种新任主席和华人甲必丹之间的对抗情况，到后来，就演变成华人自己所谓的‘新’‘旧’派系。有钱又满于现状的华人甲必丹本来就比较保守，热心教育的学校董事部主席比较前进派。学校出现之前，这种分划并不太明显，但设立学校却让各乡区学校董事部成为挑战华人甲必丹的平台。”

（黄建淳 1999：120）

（六）身份认同问题

新旧分歧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权势争夺和社群公共事务上。在新旧两种势力交锋之际，砂拉越华社内因出身地不同而出现的身份认同差异也日益明显，尤其对中国这个祖国的情感更因年龄、状况和教育水平而有所不同。（Leigh 1964：32）⁵

对生于中国的移民人来说，中国是老死的长眠之处。在年老时，他们一心只想着回家。一些人甚至强调，只有在中国，才能办一场妥当的葬礼。

“对本地出生的人来说，中国是如此难以捉摸…本地出生和中国出生，他们都是华人，唯一不同的是情感的伸缩性。在某些方面，本地出生者的民族意识比在中国受教育的人还要强，这不难理解：对中国出生的华人来说，新的侨居地还是非常神秘和亲切的，他们一直在窥探，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但对本地出生的华人来说，外国不再神秘，他讲外国语、他碰见很多外国人，如今他想探索的是中国的神秘。他心目中的中国和那些中国出生的朋友应该也不一样，他或许会抗拒他们夸大的描述，他也可能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在祖国之上，将它想像成比实际更理想的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他感觉自己必须亲自去看看。”

“中国的神秘感在本地出生者心里引起非常复杂的感觉，他们一方面为祖国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也一直想不透，为什么祖国不应该是现代强国。很多人都想尽量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也小心翼翼的追查它的当

⁵ 1947年人口普查统计，本地出生华人在华人总人口中的比例为64%，到1960年则提升为80%。

代历史事件，一些人甚至还决意学习阅读和书写那些他们小时候没有注意的如虫般的中文字。而进度太慢也会让他们心灰意冷的放弃，对自己说，还是不要对中国这么有兴趣比较好，但只要他们觉得对一些事情灰心失望，祖国就会再次成为他们情感上的慰藉。不管在国外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有‘中国’就万事安好。在这里，那不只是个人的满足感，还有一种社会凝聚力……”

(黄世广 1954: 105, 135-136)

虽然田汝康并没有明确指出华社新旧两派人士的真正立场，然而，在这个半新不旧的战后初期社会里，“新旧之分”其实是以政治立场来划分，支持国民党，对国父孙逸仙和蒋介石总统崇敬有加，视新中国政权为“伪政权”的旧派人士，包括上流社会的权贵和领导以及曾经大力支持筹赈祖国抗战的华社人士。而新派人士则大多是鼓吹社会改革，支持新中国共党政权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向往中国解放的激进之士。

而如此回异的新旧政治取向也成为后来华侨国籍问题中极为关键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宋明顺 1978: 73)⁶ 旧派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失去原有的政治优势，也削弱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感。新派人士则恰好相反，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与胜利，使他们更坚决推行社会改革，新中国的诞生，进一步深化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加剧了他们报效祖国的决心，于是在50年代初期，砂拉越华社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回国青年热潮，引起英殖民地政府的忧思。

但吊诡的是，砂拉越华社之中的新旧之分却仍旧与经济紧密相连。财势雄厚的旧势力一心想掌控社会经济大权，坚决反对社会改革和重组。而新派人士却“为了加速砂拉越的经济发展”(Tien 1997: 121)而大力鼓吹并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和重组。两者之争，所为也是“经济”。

五、一些有待商榷和补充的问题

严格上来说，《砂拉越华人》报告书的结构清楚明了，它以单一族群的角度，将华人从砂拉越整个社会结构中硬生生的分割出来，虽然其中的调查结果和观点在某种程度上，

⁶ 在1955年4月18-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期间，以中国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此条约列明中国政府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华侨可以放弃中国国籍，确认所在国国籍。周恩来当时指出：“如果他们（华侨）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选择保有所在国的国籍，就应得到公正的待遇，但他们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留在国外，他们将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

周恩来在华侨国籍问题上主张“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重点应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国籍。”他清楚指出“凡已经或自愿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侨，就当然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亲戚关系。华人成为所在国公民以后，应当效忠入籍的国家，应当同当地人民一道为所在国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繁荣做出贡献。同时也希望海外华人为促进所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起积极作用，以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人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呈现出当时的华社实况，但却无法全面体现整个大环境图像。

诚如先前所说，此调查计划是由英国官方资助，而目的主要是为了协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有效地统管砂拉越各民族，因此，在设定调查重点、观点及地点和人选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的研究计划由官方资助，这常让我的个人立场左右为难，客观的提问常引起华人和欧洲人的猜疑。”（Tien 1997：4）

田汝康的调查工作局限性包括：

（一）族群关系

只是研究单一的华人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其它相关要素。实际上，在砂拉越境内，华人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一种民族，华人与其它族群间的关系，尤其经济关系也是社会结构中密不可分的要素之一。（蔡增聪 2003：133；Leigh 1964：37-39）

（二）其它社会性因素

如宗教、教育、文化等。宗教，如传统华人社会心灵依归的民间信仰（蔡宗祥 1996：13）和基督教对砂拉越华人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庙堂是华人移民的主要社交场合，（Chin 1981：80）而对拉让江流域的华人而言，基督教甚至新福州诗巫的移民活动，（Leigh 1964：29）实际上，砂拉越早期移民中，有不少信奉基督教的华人。而根据1947年砂拉越人口普查报告，华人基督徒人数为2万5,486人，占砂拉越华人总人口的17.6%，（饶尚东 1992：93）其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由于田汝康的研究范围以古晋及邻近地区为主，没有深入调查扎根在诗巫，与新福州移民有密切关系的卫理公会与其它宗教团体概况，也因此未能详加调查研究。

在海外华人普遍看重的教育课题上，田汝康在第九章探讨华社领导问题时，粗略的点到学校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所论述的内容和观点以华人领导在校务上的影响力及学校董事部的权限问题为主，对教育课程纲要、内容与战后初期所推行的社团教育也着墨不多。（田英成 2011：64）

而报告书中也没有论及影响砂拉越华人社会极为深远的文化和文艺活动及相关事宜，包括战后蓬勃发展，提高教育水平的砂拉越报业。（Chin 1981：106）

（三）国内外局势

已故砂州文史工作者刘子政称50年代为“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刘子政 1992：7）而田汝康所处的砂拉越，正值大动荡前夕，砂拉越华人社会在各种历史事件的冲击与洗涤下，显得格外躁动不安。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可能切割成个别片段加以理解陈述。

砂拉越文史工作者田英成在其论述中也强调战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内在与外在的两股原动力，内在原动力包括方言群体的分化与冲突、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外在因素包括中国政治的冲击、居留地政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冲击以及世界局势发展的冲击。（田英成 2011：65）

从1937年的中日战争、1941年的二战及3年8个月的日本统治、1945年的光复、1946年7月1日的让渡事件、中国国民党在古晋设立海外俱乐部、194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在砂拉越

设领事馆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政权，各种内外历史事件对砂拉越华人社会影响深远，（Purcell 1965: 372-373；刘子政，1992；John M. Chin, 1981）⁷ 实际上，华人在1946年砂拉越让渡事件中的冷淡与七七事变、筹赈祖国难民会和新中国成立时的澎湃爱国意识也与砂拉越华人的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建淳 1999: 7）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田汝康并未能将历史因素纳入报告书中加以讨论。

（四）调查范围

田汝康的研究范围集中在“包含几乎所有不同方言群，最能全面研究方言群关系”的古晋，虽然“只要是对研究有助益的或有截然不同差异处，我也引用了其它省份收集到的资料来加以说明”，（Tien 1997: 2）但实际上，对古晋地区以外的华社结构着墨不多。

当年交通极为不便的砂拉越，各地之间相互隔绝，互不往来，因此差异性也相对的大。各地经济活动和方言群关系，甚至会馆组织都不尽相同。比如美里的采油活动和油田公司所引进的香港技术工人改变了美里和北砂华人原有的社会结构，而二战期间日军猛烈轰炸美里，战后美里大兴土木，四处招揽华商与华工，原本定居在中区的福州人因而涌入美里，改变了美里及邻近地区华社的原有社会结构。（蔡宗祥 1997: 92）

古晋及邻近地区的华人社会并不能代表整个砂拉越华社，只能说是代表砂拉越第一省，或南砂地区的概况。

（五）身份与认知

田汝康乃留学英国的中国学者，在英国官方的资助下，到砂拉越研究华人社会结构。虽然同为华人，语言和文化上虽然没有隔阂，然而生活经历与地理历史条件都不尽相同，（饶尚东 1995: 18）⁸ 短短一年的调查能窥探到华人社会结构的形态，却无法深层剖析其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比如，报告书描述砂拉越华人方言群聚居的现象，凸显宗亲会和方言群会馆的社会功能，但方言群聚居的原因不只是地缘性或共同语言使然，没有共通语言、缺乏沟通桥梁，容易因误解而引发械斗事件也是原因之一。而华人因为鲜少与原住民沟通，对原住民存有误解，处处担心本身安危，因此选择与同族聚居，不过，为了融入当地社会，砂拉越华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原住民的影响。（林青青 2005: 187-191）非砂拉越土生土长的田汝康即便观察到些许迹象，也无法全盘理解其中错综复杂的情意结。而英殖民地政府的资助也成了研究包袱，限制了他的学术触角。

另一方面，早期在中国农村的调查工作经验⁹ 让田汝康做起田野调查来显得驾轻就熟，但在这些调查工作经验的影响下，田汝康将砂拉越华人社会视为单一族群，以中国农

⁷ 巴素在其著作中提及七七事变对砂拉越华人的影响（参见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 372-373），而刘子政及 John M. Chin 也分别在著作中论述了内文中各种历史事件对砂拉越华社的影响。参见刘子政《砂拉越五十年代史事探微》、John M. Chin, *The Sarawak Chinese*。

⁸ “东南亚的华人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么单纯...”。

⁹ 田汝康在西南联合大学念哲学心理学时，曾经选修社会学，成为费孝通的学生，经费孝通介绍，加入“魁阁”。“魁阁”是 1939 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合作创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因日机轰炸昆明搬迁至近郊呈贡古城“魁星阁”而得名。这个工作站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人创建的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大学毕业后，田汝康继续留在工作站，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先后完成两项调查工作，一是《昆明工厂女工》，另一则为云南缅甸边境傣族社群的宗教仪式研究。

村的研究形式来加以剖析，无形中缩小了原有的研究范畴，委实让人扼腕。

（六）调查时机

田汝康初到砂拉越之时或许没想过砂拉越华人社会是如此庞杂多变，而他更没想到的是中国，这个海外华人心之所向的祖国在这一年间风起云涌，发生了划时代的政治变局。1948年9月7日，田汝康到砂拉越之时，仍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旗帜。1949年10月23日，他乘坐“拉惹布洛克”号挥别古晋时，新中国的红色五星旗已四处飘扬，一场属于全世界华人的社会改革正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而他却无法继续留在砂拉越见证如此巨大的变动，不过数十年后，田汝康以另一篇专论来对比砂拉越华社30年来的发展，也算是填补了当年的些许遗憾。

六、结语

在英殖民地政府眼中，华人的经济角色尤其重要，因此，政府所关切的华社问题，自然与经济相干。此报告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虽然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而显得有所偏颇，内容论述也不尽完整，但却不失为一份较为可靠，有参考价值的学术专著，尤其对不谙中文的外国学者来说，更是极为难得的学术参考书。

田汝康以经济角度来解读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虽然研究范围仅限于古晋及邻近地区，但也能藉由战后砂拉越首要行政中心的华人概况为缩影，进一步了解砂拉越华人在战后初期所扮演的经济角色。

1980年，田汝康参考各种已发表的资料，回望砂拉越华社30年来的变迁，发表了《砂拉越华人：三十年之变迁》，点出砂拉越和沙巴、马来亚、新加坡共组马来西亚后，华人社会权力架构的更迭，福建人和潮州人不再盘踞商业龙头大位，30年前华社权力架构边缘的另三个方言群，诏安人、兴化人和客家人却成功挤入主流行列。

而50年代末期砂拉越政党和选举制度的出现，限制了旧制度下领导操控华社的野心，旧制度的式微也促使方言群组织领导层的调整以及商会的权力重组，纵观当时砂拉越华社的种种情况，田汝康认为，他在30年前所提出的华社诉求已经实现。（蔡增聪 2003: 73-86）

参考文献

中文：

- 蔡增聪, 1998, 《历史与乡土》, 砂拉越: 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诗巫省分会出版, 页19。
- 蔡增聪编, 2003, 《砂拉越华人研究译文集-砂拉越华族-土著的关系: 一个历史的探析》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73-86、133。
- 蔡宗祥, 1996, 《砂拉越华人民间信仰》,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13。
- 蔡宗祥、徐元福编, 1997, 《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 美里: 美里笔会, 页92。
- 傅德华、翠艳, 2010, 〈“魁阁”的重要成员田汝康先生——兼论田汝康与费孝通的师生情谊〉, 中山学社编, 《近代中国》第20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高亚伟, 1975, 《世界通史》下册, 台北: 高亚伟, 页21。
- 黄建淳, 1999, 《砂拉越华人史研究》, 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页7、55、110、115、117、118、119、120、134-135、414、415。
- 黄世广编, 1954, 《华侨在诗巫》, 台北: 中国印刷厂, 页105、135-136。
- 黄枝连, 1992, 《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 探索走向21世纪的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李南林、田农编, 1985, 《砂拉越华族史论集》, 古晋: 砂拉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
- 林青青, 2005, 《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说唱艺术及其华族文化色彩》,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187-191。
- 刘子政, 1992, 《砂罗越五十年代史事探微》, 砂拉越: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7、60-61、58-59、61-62。
- 刘子政, 2000, 《砂拉越史事论丛》,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 丘立基, 2003, 《砂拉越史话》, 古晋: 黄文彬报业机构。
- 饶尚东, 1995, 《落地生根-海外华人问题研究文集》,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18、73。
- 饶尚东、田英成编, 1992, 《砂拉越华族研究论文集》,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14、93。
- 宋明顺, 1978, 〈东南亚华人及其前途-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冲击〉, 崔贵强等人编,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新加坡: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页73。
- 田英成, 1999, 《砂拉越华人社会的变迁》,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 田英成, 2011, 《砂拉越华人社会史研究》, 诗巫: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 页64、65。
- 王曾才编, 1970, 《西洋近代史》, 台北: 正中书局。
- 许世韬, 1992, 《砂拉越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90周年纪念刊 (1901-1990)》, 诗巫: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
- 伊士顿 (Easton, Stewart C) 著、李迈先译, 1969, 《西洋近世史》(The Western Heritage), 台北: 幼师文化事业公司, 页259-26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1997,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页1617。

英文：

- Brooke, Charles. 1990. *Ten Years in Sarawak*.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4
- Chin, John M. 1981. *The Sarawak Chines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1, 68-69, 80, 106.
- Hanks, Patrick (ed.). 1988. *The Collins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nd ed.). London: Collins. pp.219, 565, 219.
- Harrison, Tom. (ed.) 1959. *The Peoples of Sarawak*. Sarawak: Sarawak Museum.
- Leigh, Michael B. 1964.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arawak*.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p. 29, 32, 37-39.
- Ooi, Keat Gin. 1997.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Of Free Trade and Native Interests-The Brook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arawak,1841-194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49.
- Pringle, R., Rajahs & Rebels. 2010. *The Iban of Sarawak Under Brooke Rule, 1841-1941*. Sarawak: UNIMAS. p.383.
- Purcell, Victor. 1965.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Payne. 1986. *The White Rajahs of Sarawak*.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 Runciman. 1960. *The White Rajahs-A History of Sarawak from 1841 to 1946*.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en, Ju Kang. 1997. *The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Sarawak: SUPP Headquarters Research &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 . pp. VII, 2, 4, 27, 28, 33, 34, 61, 83, 85, 87, 92, 103-104, 121, 137.